



府创建国家级博物馆，“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现代知识应备之资料，为系统之陈览，永久之保存”。这一倡议得到响应，1933年4月，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京鸡鸣寺1号正式成立，傅斯年出任首任筹备主任，开启了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的艰难起步。

筹备之初，核心任务便是藏品征集与场馆建设。据历史资料介绍，中博院起初计划设立自然、人文、工艺三馆，凭借官方背景支持，通过划拨、征购等方式，很快发展为藏品可与故宫媲美的博物馆。这一说是有理论依据的——在民国时期，中博院侧重征集可以反映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文物和出土文物，藏品时间范围更广，而故宫的藏品则以皇室珍藏为主，缺少考古发现和自然标本。仅从藏品来看，当时就集中全国第一流珍品二三十万件，其中包括绘画中的《历代帝后像》《唐人明皇幸蜀图》；铜器中的毛公鼎、后母戊鼎等稀世国宝。

1933年10月，中博院接收了原藏于清朝奉天和热河行宫、经北平南迁的近两万箱宫廷文物，构成了馆藏的基础。与此同时，场馆建设被提上日程。经多方选址，最终确定在中山门内半山园征地193亩作为院址，并成立建筑委员会，由翁文灏任委员长，梁思成担任专门委员负责技术指导。在十多位建筑师的方案竞标中，徐敬直的设计脱颖而出，后在梁思成的修改完善下，确定采用仿辽代建筑风格，力求“体现中国早期建筑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同时区别于中山东路上其他几幢大屋顶的仿古建筑。

在最初的规划中，国立中央博物院的设计规模十分宏大，这就需要建筑风格气魄宏伟，严整开朗，才能达到原本设想中的效果。20世纪初的中国早期现代设计师们，受欧美复古思潮的影响，推崇唐、辽式建筑风格。以梁思成、刘敦桢为首的古建筑研究机构“营造学社”发现，辽代建筑不仅在风格上继承了唐代建筑的豪爽之风，而且更有加强的趋势。辽代建筑以造型朴实雄厚而出名，因此它的屋面坡度较平缓，同时立面上的柱子从中心往两边逐渐加高，使檐部缓缓翘起，不仅给人轻快

腾飞之感，减弱了大屋顶的沉重感，同时也扩大了屋子内部的空间，更好地满足展览陈列空间的规整需求。

1936年6月6日，中博院第一期工程开始动工，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工程被迫停工，此时主体建筑仅完工75%。与此同时，为保存南迁文物，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南京修建朝天宫文物库房，库房占地广阔，地上三层、地下一层，总面积近万平方米，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文物库房，装有当时世界领先的安防与消防系统，采用四方结构和厚重铁门确保文物安全。随着朝天宫库房落成，存放在上海的南迁文物分批运往南京，存放于此。

1937年7月，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兵锋逼近南京，文物再次被迫迁徙，为守护珍贵文物，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连同所属的文物迁离首都南京，将文物分三路转移到西南各处，经过数处转辗，最终于1940年底驻扎于宜宾李庄，在艰苦的环境中，筹备处并未停止工作，不仅举办了“史前石器展览”等公益展览，还组织学者开展田野考古，主持发掘了四川彭山崖墓等遗址，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为中国文博事业保留了火种。不仅如此，还与同在一地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著名科研教育机构一起成就了李庄“抗战文化中心”之名。

1945年抗战胜利后，西迁文物分批运回南京，场馆建设得以续建。1948年4月，第一期工程及附属工程基本竣工。同年5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在新落成的博物院陈列室内举办了联合展览，展出商周铜器、汉代文物、民族文物、历代帝后像等，蒋介石、于右任等要员名流出席、参观，观者塞途，观众达10万余人次，展现了文博事业的强大生命力。然而，1948年底，部分珍贵文物被运往台湾，成为两岸文化界的永久遗憾。据统计，部分文物运往台湾后，南京库房尚存文物11178箱，于20世纪50年代陆续由南京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至1958年北运结束，仍有部分文物（2221箱，约10万件）